

補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國佛教  
版畫全集

中國書局



#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

補編·第一九卷

烏日切夫 主編

## 第一九卷 叙錄

本卷所收為烏日切夫著述《蒙古佛教版畫概述》一文、蒙文單經三種及蒙文《甘珠爾》《丹珠爾》版畫。

聞名于世的蒙古文《大藏經》亦稱《甘珠爾》《丹珠爾》，是蒙古民族的重要文化遺產，是研究蒙古族文化史、科技史、宗教史、文藝理論、翻譯理論、語言學、哲學、醫學等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獻，它既是佛教百科全書，又是「蒙古族佛教佛像版畫藝術大全」。蒙文《甘珠爾》版畫，其在蒙古佛教版畫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它的刻印不僅對蒙古地區佛教版畫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而且還深刻影響了清代宮廷甚至整個藏傳佛教地區佛教版畫的刊印。

蒙古文《甘珠爾》刊印于清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共一百零八卷，每卷單獨成冊，共計一百零八本。其中《秘密經》《大般若經》等又各自成爲一套叢書。《秘密經》第一卷由十一篇經文組成，第二卷由六篇經文組成，每篇又成單行本，所以各卷也是由多個單行本組成的叢書，形成二十五部書組成的大型叢書，《大般若經》（十二卷）即由十二部書組成叢書。

蒙古文《甘珠爾》現已知在國內存六套，分別是：（一）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藏《甘珠爾》，于一九五六年請自烏喇特中旗昆都倫廟（今屬包頭市）；（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信息中心藏《甘珠爾》，于一九五八年請自烏蘭察布盟達茂旗達噶廟；（三）內蒙古大學圖書館藏《甘珠爾》，于一九五九年請自察哈爾察罕烏喇廟；（四）中國民族圖書館藏《甘珠爾》，于一九五六年請自巴林右旗西大廟；（五）國家圖書館藏《甘珠爾》，于一九六一年由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請自烏喇特中旗阿拉坦布素廟後贈送；（六）西藏布達拉宮收藏蒙古文《甘珠爾》，自清代一直保存至今。【二】另外，蒙古國烏蘭巴托、法國巴黎和印度新德里各藏一套蒙古文《甘珠爾》經。

蒙古文《甘珠爾》每函首、末頁內都有精美的版畫插圖佛像。首頁兩邊刻有二幅精美朱印佛像，中間有蒙古文朱印經文；末頁同樣有五幅朱印佛像。據推算一百零八部，共計有佛像七百五十六幅。

蒙古文《甘珠爾》圖像是經過元、明、清三個朝代佛像體系的傳承和發展而來。元代是藏傳佛教圖像體系形成階段，明代是藏傳佛教圖像體系承前啓後時期。對比明代永樂版藏文《甘珠爾》圖像，可以看出清代康熙版蒙古文《甘珠爾》經圖像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永樂版《甘珠爾》的圖像特點，也統一和規範了它的插圖風格，這一變化對清代佛教圖像藝術有重大影響。其插圖形式和裝飾風格深刻影響了清代蒙古、滿、藏文佛經插圖和裝飾風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清代幾大佛像集和《造像量

度經》。

蒙古文《甘珠爾》插圖形式和裝飾風格深刻影響了清代蒙古、滿、藏文佛經插圖和裝飾風格。比如蒙古文《甘珠爾》插圖風格形式直接奠定了蒙古文《丹珠爾》的版畫插圖圖像風格和裝飾風格。後者是前者版印插圖的繼承和延續。乾隆時期滿、蒙、藏和漢文合璧的《楞嚴經》插圖和藏、滿、蒙、漢合璧的乾隆年間泥金寫本藏文《大藏經》裝飾圖與蒙古文《甘珠爾》插圖的版式設計和裝飾紋樣以及圖像風格極其相似。

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滿文《甘珠爾》的版式設計、插圖形式、裝飾紋樣以及整體風格完全是按照蒙古文《甘珠爾》的風格來刊印和繪製的。但滿文《甘珠爾》與蒙古文《甘珠爾》的佛像插圖從內容到形式也有一定區別。比如，清內府檔案記載中，蒙古文《甘珠爾》經首兩尊佛像，經尾四尊佛像，但是實際刊印和繪製的經尾佛像都是五尊，所以檔案記載和實際情況有出入。滿文《甘珠爾》同樣一百零八部，經首兩尊佛像，但是經尾有的是四尊，有的是五尊，這一點與蒙古文《甘珠爾》形式上有區別，並且插圖佛像數量少于蒙古文《甘珠爾》。

清乾隆時期刻印的《三百佛像集》和嘉慶時刻印的《五百佛像集》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文《甘珠爾》的圖像影響。蒙古文《甘珠爾》之前的明代《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佛像集的頭光和身光都是馬蹄形，蒙古文《甘珠爾》及以後的《三百佛像集》《五百佛像集》《諸佛菩薩聖像贊》的頭光都變成了圓形。三者的佛菩薩像的動態、坐姿以及高髮髻的五葉冠十分接近，圖像的沿襲關係十分明顯，從它們的圖像這些相似之處以及蒙文《甘珠爾》在蒙古地區乃至整個藏傳佛教地區都具有的影響力來看，刊刻在後的佛教版畫集《三百佛像集》和《五百佛像集》借鑒一些蒙文《甘珠爾》的圖像特點應該是順理成章的。

此外，清代佛教圖像藝術中最有影響的是烏珠穆沁蒙古人工布查布編譯的《造像量度經》，它也同樣受到蒙古文《甘珠爾》的圖像影響。《造像量度經》是乾隆七年（一七四二）譯著，而蒙古文《甘珠爾》一七二〇年已經刊印，後者對前者的佛像規範有着直接影響。比如《造像量度經》的護法明王像的形象、動態以及外圍桃形身光明顯繼承了蒙古文《甘珠爾》的金剛手造型風格。

蒙古文《甘珠爾》的木刻出版不僅是清代蒙古文出版業的一件盛事，也是清代蒙古族佛教版畫偉大的里程碑，對清代蒙古族佛教版畫圖像演進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其精美獨特的佛像插圖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清代宮廷造型藝術的圖像演變，更影響了滿清最大的佛教盛事，對滿文《甘珠爾》宮廷版畫的風格形成有着直接的影響。蒙古文《甘珠爾》版畫的精美甚至超過了半個世紀後以清朝統治主體滿族母語刻印的滿文《甘珠爾》的版畫插圖。可見當時蒙古人對佛教的虔誠態度以及刊印蒙古文《甘珠爾》的編輯繪製者與刻工等精英團隊的高超技能。

---

注釋：

【二】故宮博物院亦發現蒙古文《大藏經》，苦于缺乏詳細的對照資料，無法確認具體信息，有待進一步研究。

# 第一九卷 目錄

叙錄

蒙古佛教版畫概述 烏日切夫著

二十一度母贊 北元（明代）

內文

插圖及內文

佛陀十二事業 明

插圖及內文

朱印格薩（斯）爾傳 清·康熙

插圖及內文

蒙文甘珠爾 大般若經 清·康熙

第一卷上一扉畫

第一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第一卷下一尾畫

第一卷下一尾畫之局部

第二卷上一扉畫

第二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第二卷下一尾畫

第二卷下一尾畫之局部

第三卷上一扉畫

第三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第三卷下一尾畫

第三卷下一尾畫之局部

第四卷上一扉畫

五八

第四卷下一尾畫

六〇

第五卷上一扉畫

六二

第五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六四

第五卷下一尾畫

六六

第五卷下一尾畫之局部

六八

蒙文甘珠爾 諸品經 清·康熙

第二卷上一扉畫

七二

第二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七四

第二卷下一尾畫

七六

第二卷下一尾畫之局部

七八

蒙文甘珠爾 秘密經 清·康熙

第一卷上一扉畫

八〇

第一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八二

第一卷尾一

八四

第一卷尾一之局部

八六

蒙文甘珠爾 清·康熙

蒙文甘珠爾

九一

蒙文甘珠爾 秘密經 清·康熙

第二卷上一扉畫

一〇五

第二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一〇六

第二卷尾畫

一〇八

第三卷上一扉畫

一〇九

第三卷上一扉畫之局部

一一〇

第三卷尾畫

一一一

蒙文甘珠爾 清·康熙

---

蒙文甘珠爾	.....	一一二	
蒙文甘珠爾 二般若經	清·康熙	.....	一一三
第一卷上一扉畫	.....	一一四	
蒙文甘珠爾 華嚴經	清·康熙	.....	一一六
第三卷上一扉畫	.....	一一八	
蒙文丹珠爾	清·乾隆	.....	一二二
經頭佛像	.....	一二九	
經頭佛像之局部	.....	一二二	
插圖及內文	.....	一二二	

---

# 蒙古佛教版畫概述目錄

第一章 早期蒙古佛教與佛教版畫概況	一
一、藏傳佛教和版印技術在蒙古地區的傳播	一
二、蒙藏佛教版畫的雛形與發展	四
第二章 蒙古佛教版畫的分類概述	二一
一、以表現形式分	二一
(一) 單色木版畫	二一
(二) 套色木版畫	二一
(三) 木版設色	二二
二、以版種分	二四
(一) 木版畫	二四
(二) 石版畫	二四
(三) 銅版畫	二六
三、以材料分	二七
(一) 紙製版畫	二七
(二) 絹製與布製版畫	二八
四、以文字分	二八
(一) 漢文佛教版畫	二八
(二) 蒙古文佛教版畫	二九
(三) 藏文佛教版畫	二九
(四) 多種文字佛教版畫	三〇
第三章 清代蒙古佛經版畫	三二
一、清代蒙藏佛像體系的發展	三二
二、清代蒙古佛經版畫的特點	三七
(一) 內容豐富	三八
(二) 形式多樣	三九
(三) 工藝獨特	四〇
(四) 造型誇張和刀法多變	四二
(五) 廣泛的傳播	四二
第四章 清代蒙藏墨刻唐卡	四六
一、清代蒙藏墨刻唐卡的種類	四六
(一) 木版唐卡	四六
(二) 石印墨刻唐卡	四七
二、蒙藏墨刻唐卡的特點	四七
第五章 清代蒙古族民間佛教版畫	五二
一、供養類佛像	五二
二、祈福、辟邪符咒類	五四
三、供品類圖像	五八
四、黑莫勒	六一
古籍文獻參考書	六九
蒙古文參考書	七一
漢文參考書	七二
外文參考書	七七
參考文章	七八



# 蒙古佛教版畫概述插圖目錄

## 第一章 早期蒙古佛教與佛教版畫概況

圖1-1: 元代《入菩薩行論》印本殘葉	五
圖1-2: 元代《善說寶藏》刻本殘片	五
圖1-3: 元代《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刻本殘片	六
圖1-4: 元代沙符印板	六
圖1-5: 元代藏文佛經《阿毗達磨內蘊擇》	六
圖1-6: 元代藏文佛經《中論智慧疏詳語》 (中觀根本名句論)	六
圖1-7: 元代《普寧藏·密咒圓因往生集》內文	八
圖1-8: 元代《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	八
圖1-9: 明永樂版藏文《大藏經》插圖	一一
圖1-10: 明代麗江版《甘珠爾》	一三
圖1-11: 清康熙版《甘珠爾》	一三
圖1-12: 清康熙三十九年《甘珠爾》和同樣佛像風格 單出品的《甘珠爾》	一四
圖1-13: 清康熙三十九年兩部《甘珠爾》經文	一四
圖1-14: 清康熙三十九年兩部《甘珠爾》 首頁佛像	一四
圖1-15: 清康熙三十九年兩部《甘珠爾》 末頁插圖	一五
圖1-16: 清康熙三十九年朱印《甘珠爾·秘密經》	一五

## 第二章

第二十二卷《首末頁佛像》	一五
圖1-17: 《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	一六
圖1-18: 北元(明代)藏蒙文合璧 《二十一度母贊》	一六
圖1-19: 清代藏漢文合璧《二十一度母頌》	一六
圖1-20: 清代朱印藏蒙文合璧《二十一度母頌》	一七
圖1-21: 清代墨印藏漢文合璧《二十一度母頌》	一七
圖1-22: 清乾隆《乾隆大藏經·二十一 度母贊》(局部)	一七
圖1-23: 明代朱印佛像集	一七
圖1-24: 清乾隆《三百佛像集》	一七
圖1-25: 清嘉慶《五百佛像集》	一八
蒙古佛教版畫的分類概述	二一
圖2-1: 清代《供養圖》	二二
圖2-2: 清代《格薩爾王》	二二
圖2-3: 清光緒《佛傳圖》(藏文《聖般若 波羅蜜多八千頌》)	二三
圖2-4: 清代《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	二三
圖2-5: 一二四六年『貴由可汗印』	二五
圖2-6: 元代敦煌莫高窟石刻(六種文字合璧)	二五
圖2-7: 蒙古青銅經版	二六
圖2-8: 清光緒紫銅版《八千頌》	二六
圖2-9: 清光緒銅版《八千頌》	二六
圖2-10: 烏蘭巴托寶格達汗宮藏紫銅版經版	二七
圖2-11: 蒙古國鋅版佛像	二七

圖2-12	清代絹印佛像	二八
圖2-13	清代布印佛像	二八
圖2-14	清乾隆《造像量度經》	二八
圖2-15	明代蒙古文《佛陀十二事業》	二九
圖2-16	晚唐《無量壽佛陀羅尼輪》	三〇
圖2-17	元代《普寧藏·阿彌陀經》扉畫	三〇
圖2-18	北元《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三〇
<b>第三章 清代蒙古佛經版畫</b>		
圖3-1	清康熙北京朱印藏文《甘珠爾》	三四
圖3-2	清康熙北京朱印蒙文《甘珠爾》	三四
圖3-3	清乾隆蒙文《丹珠爾》	三五
圖3-4	清乾隆五十九年《滿文大藏經》	三五
圖3-5	清光緒銅版《八千頌》	四一
圖3-6	清光緒銅版《八千頌》	四一
圖3-7	清代《蒙藥正典》	四一
圖3-8	清末《地獄經》	四一
圖3-9	日本《Buddhism Art and Faith》	四一
第二八五頁插圖		
圖3-10	《西藏古版畫紋樣集》第五二頁插圖	四一
圖3-11	清代《八千頌》版印插圖	四一
圖3-12	清代《地獄經》	四二
<b>第四章 清代蒙藏墨刻唐卡</b>		
圖4-1	清代《六世班禪像》	四八
圖4-2	十八世紀《七佛之一·迦葉佛像》	四八
圖4-3	十八世紀《六世班禪》	四八
<b>第五章 清代蒙古族民間佛教版畫</b>		
圖4-4	十八世紀《七佛之一·迦葉佛像》	四八
圖4-5	清代《釋迦佛降生圖》	四九
圖4-6	清代《釋迦佛降生圖》	四九
圖4-7	十八世紀《釋迦佛降生圖》	四九
<b>清代蒙古族民間佛教版畫</b>		
圖5-1	《閻曼德伽》	五三
圖5-2	元代《四方進寶》	五六
圖5-3	《佛道全神》	五六
圖5-4	廣東潮州冥衣供品	五六
圖5-5	漢地紙馬供品	五六
圖5-6	雲南甲馬	五六
圖5-7	廣西紙馬	五六
圖5-8	雲南麗江《六畜興旺》	五七
圖5-9	清代蒙古地區祭祀品	五七
圖5-10	清代蒙古地區祭祀品	五七
圖5-11	內蒙古鄂爾多斯黑莫勒	五七
圖5-12	清代祈福圖像	五七
圖5-13	清代護身符	五八
圖5-14	清代護身符	五八
圖5-15	清代辟邪符	五八
圖5-16	清代祭祀品	六〇
圖5-17	尼泊爾祭祀品	六一
圖5-18	清代法器供品	六一
圖5-19	西藏法器供品	六一
圖5-20	清代祭祀品	六二

---

圖5-21··· 漢地甲馬·····	六二
圖5-22··· 漢地供品·····	六二
圖5-23··· 岩畫上的黑莫勒·····	六二
圖5-24··· 銅質黑莫勒·····	六三
圖5-25··· 銅質黑莫勒·····	六三
圖5-26··· 清代版印黑莫勒·····	六五

---

## 第一章 早期蒙古佛教與佛教版畫概況

### 一、藏傳佛教和版印技術在蒙古地區的傳播

佛法從印度向外擴展，其中一支南傳至中南半島諸國，形成南傳佛教，南傳佛教的大藏經即《巴利語三藏》。另一支由絲綢之路傳至古代中國以及周邊的高麗、日本等國家，用漢字傳播的佛教俗稱「北傳漢傳佛教」。從古印度的尼泊爾以及巴基斯坦一帶傳入西藏，再延伸到西夏以及蒙古地區的北傳佛教俗稱「藏傳佛教」【一】。北傳佛教大藏經可分為漢字系大藏經和非漢字系大藏經。在中國，譯經自漢代經歷晉、南北朝而至于隋唐，又自唐朝歷經宋、元、明至清朝。歷代大藏經的問世和刊印發行直接推動了每一個朝代的版印技術發展。

「隨逐水草的馬上民族：戎狄人、匈奴人、東胡人、鮮卑人、突厥人、柔然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踏着遠古先民的足跡，以草原為舞臺，爭先恐後，競相走向歷史的前臺。二十四史續寫了他們的勝敗沉浮，地下墓葬埋藏了他們創造的財富，山口岩畫記錄了他們的習俗生活，古塔城垣留下了曾經的輝煌，召廟壁畫描繪着至今仍在傳承的信仰。」【二】考古證明，北方游牧民族早在突厥時期已經接觸佛教。在今日的內蒙古東部草原上建立王朝的契丹人接納了漢傳佛教，並大力弘揚佛教文化，營造寺塔，刊印了著名的《遼藏》。契丹人建國後，與漢、吐蕃、高句麗甚至印度人都有着文化交流，文化藝術領域包括刻版印刷技術等在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國度裏都得到了長足發展。鼎盛時期的契丹民族在當時的東亞地區占據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起初他們無造紙技術，祇是在木版上刻些符號，後來學會印刷技術，刊印了很多佛教經典書籍。【三】內蒙古地區有不少遼代寺廟和佛塔，證明了遼代東部草原游牧民族契丹人和歸屬遼國的部分蒙古人已接觸到漢傳佛教，接觸漢傳佛經版畫也就順理成章了。

北方游牧民族的另一支女真人建立金國之後，統治者同樣崇尚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普及。民女崔法珍在搜集契丹版大藏經的基礎上，用了二十四年時間，花重金重新印刷和出版了整套的《大藏經》。俗稱《趙城藏》，一九三三年首次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被發現。

『金末元初，《趙城藏》部分經版毀于兵火。太宗窩闊臺汗朝丙申年（一二三六），採納耶律楚材之建議，首倡于哈喇和林建佛寺及補雕漢文藏經（即《金藏》）。這次雕補藏經《金藏》活動規模宏大、組織嚴密、分工精細。有納林等蒙古達魯花赤、朝廷顯貴慷慨解囊，隨緣輸財；大都路三十餘所寺院的僧人參與刻經事宜。歷經六年，于癸卯年（一二四三）雕補竣工。』【四】現存的《趙城藏》係公元一二六一年（元中統二年）雕印本。一九五九年，在西藏薩迦寺北寺的圖書館內發現了三十一種，五百五十九卷卷軸式裝幀木刻印本佛經，佛經的編次和金國的《趙城藏》完全一樣。從版式、字體、刻工等諸多方面考證，學者們基本上肯定了是《趙城藏》經版入燕京後的補雕印本。

遼金和西夏時期，蒙古人與佛教有了民間接觸和交流，並且有了部分信徒。同時，蒙古人的圖書印刷技術也有着悠久的歷史。早在十世紀，其印刷技術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5】從很早開始，蒙古民族就與毗鄰相居的中原漢族發生了文化接觸和交流，並開始學習和吸納他們先進的技術，運用木版刊印書籍即是其中的一個例證。其實，從契丹到元朝時期開始，蒙古人的文化，尤其是印刷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不但有木刻板技術，還有其它版類技術。【6】這些為蒙古人利用版印技術印刷經書提供了技術上的條件。

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與蒙藏關係史有密切聯繫。蒙古族對西藏的影響主要是憑借其軍事與政治優勢，以西藏的統治者、宗教保護者和支持者的身份來實現的。在整個蒙藏民族歷史關係發展過程中，蒙古方面起着重要的主導作用，也始終是以統治者、保護者及支持者的身份出現的【7】。成吉思汗攻擊西夏時期已經接觸了藏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重要人物，但是第一個和西藏發生關係的蒙古王室成員是闊端。一二四七年初，闊端從和林回到涼州時，薩班和闊端纔在涼州舉行了有歷史意義的會見，所以稱薩班和闊端為「蒙藏關係史上的兩位拓荒者」【8】。闊端派兵進入西藏，隨之邀請薩迦班智達速赴涼州相見，完全處於主動地位，薩迦班智達則是出于被動而前往涼州。祇因會談順利達成，蒙古人纔和平解決了西藏地區的歸屬問題，揭開兩個民族密切交往的序幕。

從元世祖忽必烈開始，佛教成為國教，尤其是尊崇信奉藏傳佛教的密宗，西藏喇嘛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大元朝的帝師和大寶法王等。就榮譽而言，的確崇高至極，實質上他仍然是忽必烈皇帝授命管理藏區的朝廷大臣。為了政教合一而普及佛教，元朝皇帝忽必烈加強中原地區的寺院印經普法。雖說蒙古族先民很早就接觸了佛教文化和版印技術，但確切說蒙古族佛教版畫始創于蒙元時期。為政權和統治服務的佛經和佛教版畫在元朝皇帝頒令下，從印經技術比較發達的江浙一帶傳至北方蒙古草原，特別是元朝政治中心。在蒙古統治者主持、指導和管理下，中原地區的漢人僧俗負責繪製、雕刻、印刷大量各種文字的佛經，創作了很多蒙古文、藏文、西夏文、漢文的佛教版畫。

『元代單刻佛教經籍，遺存于世的不多，以數量和品種而言，尚不及兩宋、遼、西夏、金一代。但其中所附版畫，却不乏構圖上乘、刻印精良的佳構。無論藝術成就還是審美價值，與前朝相比，都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元代蒙古族佛教版畫因歷史的種種原因，留下來極為罕見，從藝術與學術角度研究，實物證據缺乏，有待于考證和挖掘。』【9】從以上表述來看，元朝這一段歷史時期，佛經版印技術十分發達，莊重、優美的佛教版畫繼承了歷史的傳統，又有了新的發展。例如，形式多樣、題材廣泛的各種類圖書中的版畫、單幅圖、插圖、連環畫都開始涌現，套版技術已被發明，並得以用于版畫藝術。元朝時期的版畫印刷技術的進步和發展，為北元朝和清代版畫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三六八年，元朝政府從大都（今北京）退回漠北，以喀爾喀蒙古的哈拉和林為首都，從此元朝被後人稱為北元。離開北京的蒙古人退回漠北以後的二百多年裏基本淡忘了佛教，蒙古王公貴族又信仰了「薩滿」，直到再一次引進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

說起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第二次傳播，阿拉坦汗起了重要歷史作用。北元中晚期，蒙古社會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形勢，土默特萬戶首領阿拉坦汗統一蒙古右翼，擴大駐牧地，倡導興辦農業，發展經濟，給蒙古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為整個蒙古社會的

發展起到了示範作用。

一五七八年，阿拉坦汗在青海湖邊接見了西藏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皈依佛教，并封索南嘉措為三世「達賴喇嘛」。從此開始西藏格魯派的「達賴喇嘛」系統。十六世紀後半期，由于蒙古封建主的崇信與提倡，西藏佛教的格魯派（亦稱黃教）在蒙古上層社會中逐漸傳播開來。特別是在阿拉坦汗的倡導下，以蒙古右翼王公貴族為首的蒙古諸部皈依佛教，鼓勵和支持蒙古人當喇嘛，興建寺廟，引進和翻譯大量經書。藏傳佛教在很短的時間在蒙古地區得到普及和發展，為清代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進一步傳播與發展打下了基礎。

到了北元末清初，格魯派的勢力在蒙古地區各部中得到迅速的發展。此時，蒙古人的政治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變化。林丹汗被皇太極追迫西逃青海，于一六三四年病死在青海。一六三六年，以林丹汗之子額哲為首的內蒙古各部首領在盛京（今沈陽市）集會，尊皇太極為「博格德·徹辰汗」。這標志着內蒙古各部徹底歸附了清朝。此後，清朝成為蒙古地區佛教的最高保護者，并利用佛教統治蒙古諸部。蒙古族和滿族在宗教信仰上，原本同屬一個範疇的北亞薩滿信仰。自蒙古人再度皈依佛教，教法逐漸普及之後，滿族人受到臨近蒙古部落的影響也開始信仰了佛教。

到了清代，清朝政府從蒙古人手裏接管了西藏的統治權，為鞏固西藏的統治，也為安撫諸蒙古王公貴族，清朝政府資助和鼓勵在蒙古地區建立眾多寺廟。清朝初期至後期，在蒙古地區不斷增建、擴建佛教寺廟建築，隨之喇嘛數量也大量增加，印經院和版印處也明顯增多。這些具有蒙、藏、漢民族藝術精華的寺廟不僅成為蒙古游牧社會宗教信仰、文化藝術、經濟貿易、教育和醫療的中心，而且也成為廣大蒙古地區刻印書籍的主要場所及其發源地，對蒙古族精神世界和社會生產產生了長期而深遠的影響。

藏傳佛教和佛教藝術在喀爾喀蒙古地區的傳播和發展，比內蒙古的土默特部晚幾十年，藏傳佛教及其藝術創造在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的興盛，與一世哲布尊丹巴（亦稱哲布尊丹巴一世）有直接關係。一六一四年，西藏覺囊派（Jo-nang-pa）的高僧多羅那他（一五七五—一六三四），受漠北蒙古諸汗的邀請從西藏前往庫倫（今烏蘭巴托），在漠北蒙古地區傳播佛教二十多年之久，并得到蒙古王公貴族們的信奉和支持，被尊稱為「哲布尊丹巴」（意為「尊貴的聖人」），蒙語又稱「溫都爾格根」。多羅那他去世的次年，土謝圖汗王妃生下一子，被確認為多羅那他的轉世靈童，這就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在他三歲時受剃度戒，法名為咱那巴匝爾（梵文Jnanajia，智慧金剛），五歲時坐床，法名為羅桑丹貝堅贊，于一六四九年前往西藏學經。在西藏期間，受到四世班禪大師的格楚爾戒，并宣稱他是「聖多羅那他的化身」，認可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尊號，在修身學法和生活起居等諸多方面受到很多照顧。期間，五世達賴喇嘛也接見了他。隨着清朝的建立和日益強大，通過推崇藏傳佛教和擁戴佛教領袖，擴大和加強對漠北蒙古地區影響。清廷對藏傳佛教的重視和信仰，并以此來懷柔和安撫漠北蒙古地區，同時也為喀爾喀蒙古地區的佛教藝術對清廷發生影響創造了條件。

一世哲布尊丹巴不僅是當時漠北地區的佛教領袖，更是一位佛學家、造像藝術家。他不僅在喀爾喀蒙古地區建造了多座寺廟，積極組織宗教活動，為喀爾喀蒙古地區傳播普及藏傳佛教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與葛爾丹的衝突之後，為了保護蒙古百姓的安康和鞏固發展

蒙古地區的佛教，他投靠了滿清政府。在北京的近十年的時間裏，同清朝康熙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政教關係」。在這種良好的關係之下，清廷造像藝術中被注入了濃郁的喀爾喀蒙古造像藝術新血液，清代宮廷造像藝術和圖像藝術得到了新的發展。基于哲布尊丹巴在喀爾喀蒙古地區的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和影響，這一段時間也是以北京為中心的版印技術和精美的佛教版畫在喀爾喀地區傳播最好的時期。據載，蒙古國大庫倫的衆多喇嘛不僅翻譯和印刷佛經，還印刷文學等方面的書籍。但由于戰爭等諸多原因，印刷經書的工作一度進入低潮。蒙古國學者博·仁欽說：「自從元朝滅亡以後，蒙古人在文化方面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蒙古人與鄰近民族和國家的接觸也減少了不少，尤其是從元朝開始進行的翻譯經文為蒙古文、版刻發行、建立國立學校的許多事情都進入休眠的狀態。」【10】在明朝時期，損毀了大量的蒙古文書籍，從而使流傳至今的經典少之又少。即便如此，從留存下來的少量典籍中仍然可找到蒙古人翻譯經典、印刷書籍的一些信息。

### 【11】

## 二、蒙藏佛教版畫的雛形與發展

『蒙元帝國建立，不僅加速了中華民族自周、秦以來統一的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且結束了中華民族五代以後近百年以來分裂割據狀況……自室韋後裔蒙古國大汗起，至順帝退出大都（今北京市），北走大漠，前後歷時百六十餘年。此一個半世紀中蒙古民族鐵騎馳突，中西交通與文化，賴以進一步脫開與傳播，創造東方民族足以自豪的顯耀歷史。』【12】

元代（一二〇六—一三六八年）是蒙古人的印刷技術得以繼續發展的階段。十三世紀，隨着刊印蒙古文出版業的日益興盛，蒙古人從其他民族的經典文獻中翻譯了大量的書籍，因為當時元朝有很多精通波斯語、突厥語、唐古特語、印度語的翻譯人才。除此之外，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時期創造了回鶻式蒙古文，忽必烈時期創製了八思巴蒙古文，并以此文字刊印過很多書籍。

『蒙元貴族統治者，統一全國過程中，自元太祖成吉思汗起，就十分重視從被征服的民族中，選拔各種有用人才，委以重任，講求立國之道。開國謀臣耶律楚材，就是由金入元的契丹貴族後裔。他從太宗時期中書令任內，曾召集名儒講經義于東宮，帥大臣子弟聽講，并于燕京置編修所，于平陽設經籍所，倡導學習漢族古代文化。因而，為文化教育服務的版刻、印刷事業，取得了蓬勃發展。尤其官刻，朝廷專設管理刻書機構，令專職官吏主持其實。』【13】

元世祖忽必烈『效行漢法』『變通祖述』，加速了漢文化與草原文化之間的滲透交融。朝廷設置秘書監和奎章閣以藏書畫，不少長于繪畫、雕刻的蒙漢藝術之士待詔于宮廷，相互競技，各顯身手。【14】蒙元時期，蒙古人印刷的諸多書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其他語言翻譯過來的，比如：『據歷史文獻記載，興文署早在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就曾以蒙古畏兀而字所書《資治通鑒》刻印行于世了。』

【15】流傳至今的代表作是元朝高僧撈思吉斡節兒于一三一—一三二二年譯成并用木刻版刊行的《入菩提行論》一書。雖然至今還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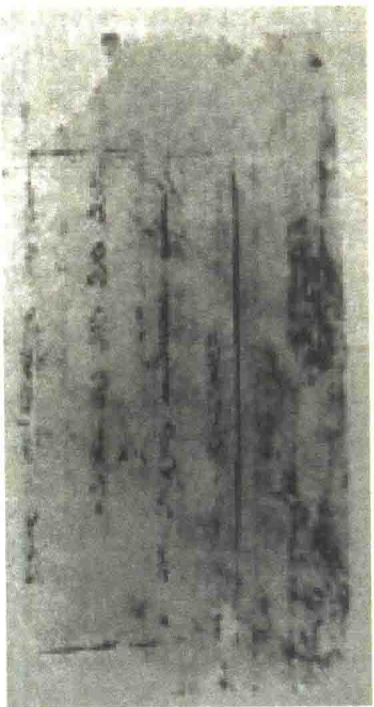


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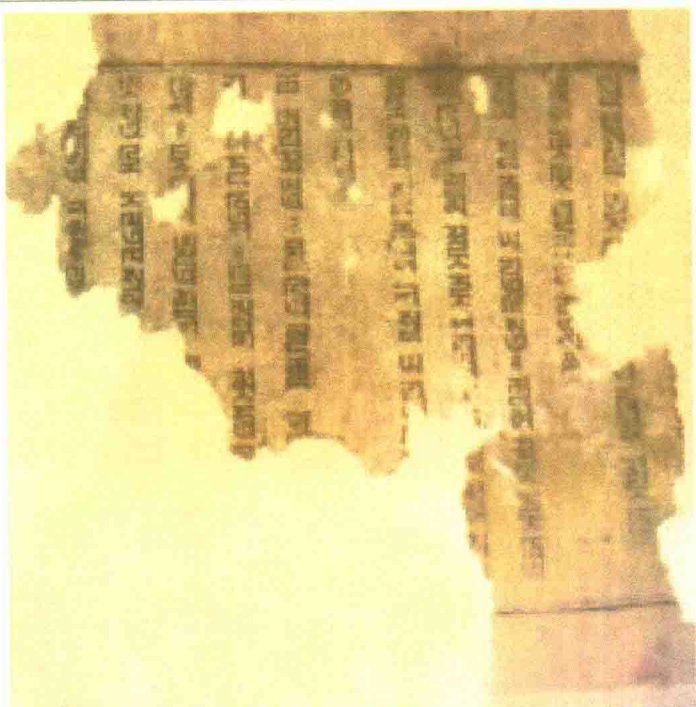


圖1-2

發現元代完整的蒙古文書籍及其插圖版畫，但零散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蒙古文佛經殘片及漢文和八思巴蒙古文合璧的佛經版畫，有力地說明了元代蒙古文經書印刷技術和佛經版畫的存在。編號B121:40文書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區第一百二十一窟。此窟出土僅此一件蒙古文文書。上、下、右單綫邊框，為一件回鶻式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薩行論》（或稱《入菩薩行經》《入菩提行論》等）殘葉【圖1-1】。【16】一三二一年，搠思吉斡節兒奉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Ayurbarwada）汗聖旨，用蒙古文撰寫《入菩薩行論疏》，并于一三二二年在大都白塔寺木刻印刷一千本，這一千本著作幾乎全部失傳。【17】還有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的一件八思巴蒙古文木刻板《薩迦格言》殘片【圖1-2】。編號B163:3（A）文書是繼赫爾辛基和柏林殘片之後的第四件八思巴文《薩迦格言》。版式和前三件有所不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薩迦格言》，又稱作《善說寶藏》（蒙語：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蒙古民間又俗稱《蘇布喜地》，是藏族著名學者薩班·貢噶堅贊（kun-dgav-rgyal-mtshan，一一八一—一二五一）用藏文撰寫的一部格言體哲理詩集。此部格言詩集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廣為流傳，從元代開始就被反復翻譯成蒙古文。據學者研究，《薩迦格言》最早的蒙古文譯文出現于十三世紀後半葉或十四世紀初，甚至在薩班活著的時候。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八思巴蒙古文《薩迦格言》印本殘片，共有四件：赫爾辛基一件、柏林二件以及本文將要討論的敦煌研究院一件。【18】『考古資料表明漢文、西夏文、回鶻蒙古文、八思巴文均不是在莫高窟北區印刷的，因為沒有發現木雕版和活字，也不可能存在印刷工廠。但是回鶻文佛經則例外，因為莫高窟北區洞窟先後發現了總數一千一百五十二枚的回鶻文活字，而且每一枚活字表面上均尚存墨迹，這個表明它們曾經被使用過。據此判斷，敦煌莫高窟北區曾經有過印刷回鶻文佛教經典的工場，北區出土的活字版回鶻文文獻中，有一些很可能是在北區印刷的。』【19】在敦煌莫高窟北區發現的回鶻文活字，完全說明了在元代回鶻文經書印刷非常發達。敦煌市博物館收藏的元代沙符板是目前我們掌握的唯一一件梵文版畫的印版，還有從北京雍和宮發現的幾部藏文佛經版畫，它的發現填補了元代的漢文、西夏文、八思巴文以外的第四和第五種文字的版畫圖像實物空白。可想而知它的歷史和文獻價值有多麼珍貴。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的一件回鶻式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薩行論》殘葉【圖1-1】、莫高窟北區出土的一件八思巴蒙古文木刻版《薩迦格言》殘片【圖1-2】、西北科學考察團從新疆吐魯番發現的回鶻式蒙古文佛教版畫殘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圖1-1】

《入菩薩行論》，敦煌莫高窟，元代，《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蒙古文〈入菩薩行論〉印本殘葉》，敖特根，二〇〇九年第十二期，蘭州學刊，No.12，總第一百九十五期。

【圖1-2】

《善說寶藏》（薩迦格言）八思巴蒙古文木刻本殘片，敦煌莫高窟，元代，敦煌市博物館藏，出土號：B163:3（A），筆者攝。



【圖1-3】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回鶻蒙古文本刻本佛經版畫殘片，元大德年間（一二九七—一三〇七），西北科學考察團黃文弼先生從新疆吐魯番采集，現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圖1-4】

沙符印板，馬圈灣出土，元代，敦煌市博物館藏，《敦煌文物》、敦煌博物館編，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二七頁。

【圖1-5】

元代（一二九九年）藏文佛經《阿毗達磨內蘊擇》，雍和宮收藏，筆者拍攝，二〇一六年。

【圖1-6】

元代藏文佛經，《中論智慧疏詳語（中觀根本名句論）》（一二三一一—一二三二〇年之間刊印），雍和宮藏，筆者拍攝，二〇一六年。

【圖1-3】以及馬圈灣出土的元代版畫板【圖1-4】的發現意義重大，它們在蒙古族文獻、蒙古文出版史和蒙古族版畫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北京雍和宮藏藏文佛經《阿毗達磨內蘊擇》【圖1-5】《中論智慧疏詳語》【圖1-6】也是元代刻印的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兩部佛經，留待下文詳述。

十三世紀後期，隨着研讀經典書籍者的增多，政府建立了國立性質的版印處和專門製作書籍的工場。國家還設立民間子弟就讀的學校，中央政府向他們提出相應的條件，合格者出任譯史、令史、通事、蒙古書寫等官職。元朝政府為加強對蒙古文字學校的管理，也設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此外還專門設立了製作這些必讀書和其他書籍、經典的版印處。『一二六四年，在元朝



圖1-4



圖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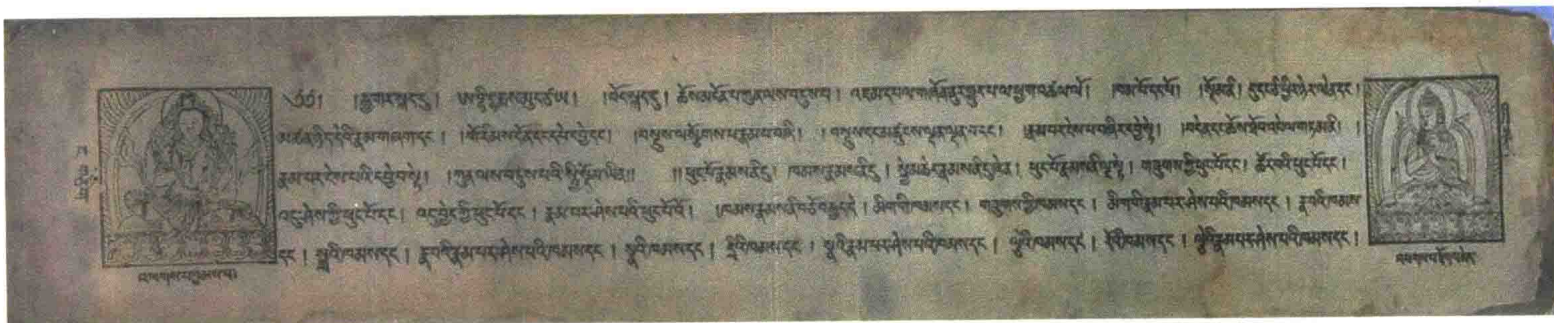


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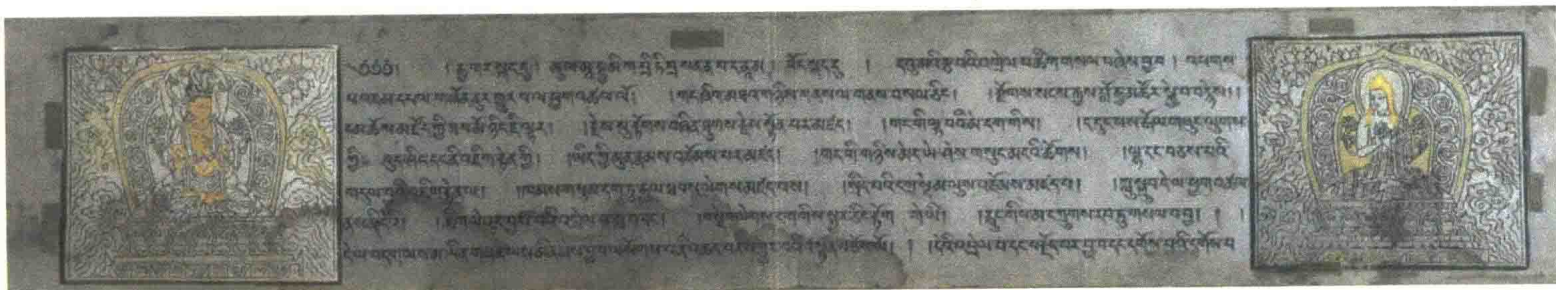


圖1-6